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机制分析*

—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

李汉卿

摘要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动群众,形成群众运动,借以实现高目标的计划指令。大跃进运动始于农业领域,而农业大跃进则以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兴修水利为开端。河北省徐水县在水利建设中,通过政治动员,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大跃进的典型。瀑河水库的修建就是徐水县兴修水利的标志性成果。在水库修建过程中,政治动员、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运动成为工程建设得以按期完成的重要保障。透过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大跃进的发动有着深刻的政治体制因素。自延安整风开始建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共产党获得全国政权后,衍生出了“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此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基于“国家控制社会”的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它也是大跃进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民的个体化需求,用集体利益抹杀了农民个人的意志,丧失了公平。这种供给模式影响至今。而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农村地区的国家权力实现由掠夺性权力向建设性权力转变,权力运行方式由集权式向民主化方式转换。为此,中国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也是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 大跃进; 群众运动; 一元化政治; 政党—国家体制; 国家——社会关系

一 引言

历史是不容忘记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饥荒。中国共产党在回首这段沉痛的历史时,总结了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其二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在胜利¹面前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的反思

是正确的而不全面的。在反思大跃进之时,我们不应该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而且要有政治视角。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而发动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³从当时中国政治现实寻找原因,大跃进得以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高度政治动员。由此,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政治动员基础上的。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则始于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兴修水利运动。⁴在这场运动中,所采用的方法——军事共产主义、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提倡等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鲜明特征,也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⁵的主要特征。河北省徐水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华北小县,却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的轰轰烈烈,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短短七个月时间,兴修水库228座,打机井2462眼。⁶正是由于徐水县兴修水利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其日后发动大跃进,成为共产主义典型做了铺垫。瀑(bào)河水库就是在这场运动中修建的,它是徐水县兴修水利的标志。可以说,大跃进时期,基于强大政治动员体制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现了高效率。本文就以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机制进行探讨。

二 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私人物品是指能够满足某单个人消费需求物品,而公共物品是指可以满足二人或二人以上消费者需求的物品。公共物品有时也被译作公共产品、公共品等。

公共物品一词首先是由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于1919年在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提出的。

然而,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给予区分,并给出明确定义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纯公共物品理论,他认为,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⁷。而后,其他学者也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认为公共物品指的是:(在该商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⁸奥尔森把公共物品定义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 $X_1, \dots, X_i, \dots, X_n$ 中的任何个人 X_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个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⁹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公共物品的两个显著特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从不同角度,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分类:(1)从公共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来看,公共物品可以分为完全非排他的纯公共物品和部分排他的准公共物品(见表1);

表1 公共物品的类型

	可竞争	非竞争
可排他	纯私人物品:如食物、衣服等各种日用消费品	准公共物品 I: 如学校、交通系统、社会保障、电影院、夜总会、图书馆、收费公路、公园、公共游泳池、自然垄断类产品等
非排他	准公共物品 II: 地表、地下水资源、地下石油、矿藏、公共草场资源、福利房等共同产权资源	纯公共物品: 国防、法律制度、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消防、街道、航标灯等

资料来源:转引自雷晓康:《公共物品提供模式的理论分析》,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4页。

(2)从公共物品的供给空间上来看,公共物品可以划分为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和地方性的公共物

表2 公共物品的空间分类

公共物品	区域	竞争性和排他性	
全国性公共物品	全国性公共物品	全国性纯公共物品	全国性准公共物品
	全国性公共物品		
地方性公共物品	城市公共物品	城市纯公共物品	城市准公共物品
	农村公共物品	农村纯公共物品	农村准公共物品

至此可以得出,农村公共物品是一种地方性公共物品,是指在农村地区范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物品,“它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到农村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又包括地方政府和农村组织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地区或部分外溢到周边地域的地方性公共产品。”¹⁰农民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主要受益者。

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农村公共物品进行分类:

(1)从公共物品的内涵看,可以将农村公共物品分为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前者指具备一定物质实体的物品,如农村中的道路、桥梁和水利设施等;后者一般不具备固定的物质形式,如政府管理、社会治安、农业科技服务等。

(2)以公共物品所发挥的作用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第一,可持续发展类公共物品,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污染防治、治理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防护林建设、生态保护、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基础教育等;第二,农村经济发展类公共物品,如道路、水利设施、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行政服务、治安等;第三,农村社会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如饮水、文化设施、广播电视、电力、通信、卫生防疫等,这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¹¹

(3)依据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和村委会组织或者其他农村社会组织供给的公共物品。前者除了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为农村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如农村的基础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后者主要是指由村民自治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用来满足村民需求的公共物品,如为了维护全村的治安,而成立村级联防队。

(4)依照公共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程度,可将其划分为农村纯公共物品和农村准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生态林网、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传播性病虫害防治、农用电网和道路设施等,其中属于农村纯公共物品的有农业发展战略,农业综合规划和农业信息系统建设,农业科技、交通、通讯骨干设施的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等;其中属于准公共物品的是指那些与地方农户利益密切,但又是个别农户所不能干或干不了的事务,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保健设施、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乡村道路建设、乡村电网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生态林网建设、小流域治理等。¹²

至此,可以看出农田水利建设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重要公共物品,特别是在农业生产落后的条件下,农田水利建设尤为重要。毛泽东早在1930年代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¹³的观点。1957年,中共中央也明确提出:“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案, 1958年3月动工, 6月底主体工程竣工. 该水库是一座以拦洪为主、灌溉为辅的中型水库, 坝体为均质土坝, 南起石龙山, 北至黄山, 坝长 5843 米, 最高坝体 21 米, 坝顶宽 4 米, 库区 11 平方公里. 大坝右侧建有明流输水洞, 闸孔面积为 4.5×4.5 米, 最大泄洪量 232 立方米/秒, 引水渠进口设有小滚水堰 1 道, 闸后洞身 60 米, 洞宽 5.9 米, 高 6 米, 洞后建有消力池及海漫段; 溢洪道位于输水洞右侧, 与输水洞平行, 宽 32 米, 最大泄洪量 770 立方米/秒, 水库总容量 9750 万立方米, 其中防洪库容 6850 万立方米, 兴利库容 2900 万立方米, 工程造价 540 万元, 其中国家投资 110 万元. 自建成以来, 经历过 1963 年大水时副坝扒口分洪、1964 年水毁工程修复、1973 年溢洪道衬砌和 1977 年大坝戴帽加高. 然而, 遗憾的是瀑河水库修建时没有防漏工程, 近年来华北地区常年干旱, 该水库已经干涸

是扩大农业生产, 提高单位产量, 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 多积肥, 多施肥, 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¹⁴ 瀑河水库作为预防旱涝灾害的水利工程是徐水县地区的重要公共物品.

三 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本文的问题由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引出, 因此需要先对水库的概况及修建过程进行描述.

(一) 瀑河水库概况

瀑河, 大清河支流, 又名雹河、鲍河. 在河北省境中部(河北省保定市). 因源短坡陡流急, 洪水暴涨暴落而得名. 瀑河发源于易县狼牙山东麓, 向东南流经徐水县, 最后注入安新县白洋淀. 瀑河水库就修建于瀑河中游(位于现在的徐水县瀑河乡).

瀑河水库¹⁵ 位于樊(fán)村村北、德山村西, 库址西南北三面环山. 1956 年由河北省水利部门勘测, 1957 年 12 月河北省政府批准施工方

图 1 瀑河水库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办公室：《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135 页.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²¹为了实现纲要所提出的目标,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兴修水利的运动。²²这个决定认为,“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单位产量,防治旱涝灾害的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同时提出了“依靠群众兴修水利”的观点,“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主要是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鼓励社员积极投资,国家只能作必要的补助。”10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²³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这篇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²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²⁵的社论。该社论进一步肯定了大跃进,认为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些文件和社论的发布,全国上下形成了讨论和贯彻《农业四十条》的热潮。农业增收,兴修水利是关键。所以,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徐水县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讨论贯彻《农业四十条》的同时²⁶,也开始制定修建瀑河水库的计划。

(三) 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瀑河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原本列入了国家海河治理计划之中,因而它的修建受到了当时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1956年4月,河北省政府委派了勘察设计人员进行地理水文勘测。此次勘测经历了一年多,直到1957年12月,河北省政府才批准修建瀑河水库。

(二) 瀑河水库修建的背景

徐水县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县。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956年及1963年均发生了较大洪涝灾害,严重地影响了该县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瀑河,横贯徐水县境中部,因源短坡陡,每当降雨后,山洪暴发,水流湍急,泛滥成灾。“据1954年到1956年三年统计,决口22处。1954年淹没土地18万亩,减产粮棉1134万斤。1955年淹没12万2千亩,减产772万斤。1956年淹没28万亩,减产1550万斤。三年统计共减产粮棉3456万斤。”¹⁶为了治理瀑河,1951年3月,徐水县就成立了春天工作委员会,进行河堤整修,对险要堤段加固处理。1954年汛期,河堤决口,10月27日进行挖河展堤。1956年和1957年又分别对不同堤坝进行加固和复堤。除此之外,瀑河水库修建之前,徐水县已经修建了象山水库、曲水水库和平原水库等19座沿流水库¹⁷,这为瀑河水库的修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瀑河水库修建的另一个背景就是徐水县高级合作化的实现。1956年1月16日,徐水县委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小社并大社,全县925个初级社合并成为84个高级社。¹⁸到1956年3月,徐水县已完成了组建高级合作社的任务。¹⁹高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取酬;牲畜、农具、果树、林木等作价归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不准出卖和出租。高级合作社的成立意味着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个人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同时有利于将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这就为瀑河水库修建之时征调大量劳力提供了可能。

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的高潮也是瀑河水库修建的重要背景。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²⁰。《农业四十条》提出了“四、五、八”的目标,“从一九五六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总座谈会和社员大会,宣传修水库的意义,培养骨干发动大家,做到家喻户晓,最后统一社员思想。

第二,房屋登记阶段,划分旧房等级填表。

第三,审查、贴榜、公布、定方案。

建房的乡社,要与盖房委员会签订盖房合同。搬家社为甲方,包房社为乙方,一切行事均以合同为准。指挥部要求2月23日开始建造新房,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即3月20日完工;要求3月21日—26日将猪舍和厕所修建完毕。此外,建房的木工和瓦工自带所需工具。

1958年1月3日开始对搬迁村民进行思想动员。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于1月15日发动了八个乡1100辆大车³³、3500人开始搬运石头。截止到2月25日,已运石头17540方。按照既定计划,2月21日,小牟山开始向雁门村搬迁,大牟山、范村、屯里和贾庄并房腾房。2月17日,开始向新村搬入一部分,3月6日搬完。2月21日,外迁村庄也要一并搬运建造房屋等所需的柁、檩、椽、门窗、条石、砖、石板等,并开始打房箔、圈箔。这两项工作均要求于2月26日完成。

1958年1月31日,指挥部向徐水县委汇报了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的进行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在搬家思想动员阶段,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会议,健全组织,成立了由主要干部7-9人组成的搬家委员会。并听取了社员的舆论和对当前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召集的会议有乡党委书记会议、支书和社长会议及由各村召开的支委会议、党团员会,首先在党内统一思想,然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干部负责分片做好宣传工作。通过会议也摸清了一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况,主要是这样三种:一是怕搬远了(搬到内蒙古);二是怕分散,见不着面;三是害怕第一年生活有困难。其中,贫农愿意搬,相信政府;上中农房子好,则不愿意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邀请怕搬远的干部社员到新村选址参观;有好房子不愿意搬的,不知道新

瀑河水库的修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库区村民的搬迁;二是坝堤及泄洪闸等的修建。徐水县委对此项工作很重视,在水库修建之前就建立起了有力的领导体系和严密的组织体系。为了统一指挥瀑河水库的修建,徐水县委成立了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该指挥部由县委委员三人组成,下设若干股。²⁷库区农民的安置工作则由盖房委员会负责。此委员会由7-9人组成,其中搬迁村三至四人、包房乡社三至四人、工作组一至二人;另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人,下设检查收验股、财务股、统计股、保卫股和宣传股。²⁸在水库施工建设方面,以村社为单位设立中队,村社干部担任中队长、副中队长和保卫委员;中队下设记工组、瓦工组、木工组、壮工组、大车组等若干组;每组各设正副组长一人。²⁹同时,徐水县委在施工前重视对干部的培训。徐水县委还计划召开参加施工的乡的党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劳力统筹安排,做到生产水利两不误。较为完善的领导和组织体系是瀑河水库较快修建完成的保障。

1. 思想动员下的库区搬迁

水库修建的首要工作是库区村民的搬迁。

对于此次搬迁,指挥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搬迁过程中,范(樊)村、大牟山、小牟山的住户需要全部外迁,屯里、贾庄村需要迁出部分居民,共计926户,4214人。³⁰除此之外,还要在他处选址以安置库区移民,需要建盖新房、猪圈、厕所等基本生活设施。按其计划,新房要按照每人0.75间的标准建造,新建3176.7间;猪圈1053个;厕所991个。³¹

为了做好库区居民的安置工作,保证水库工程正常进行,1958年1月2日,徐水县委抽调了30名县级干部,其中3名县委干部,深入搬迁村庄做好安置和土地规划调查,并详细进行了房屋等级划分、登记和确定新村位置等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³²

第一,思想发动阶段。指挥部首先在党内统一了思想,层层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召开队、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实地参观，搬迁村的干部和社员都较为满意，解除了思想顾虑等问题。

土地确定后，搬迁委员会于1958年1月14日召开了党委会议，有搬迁村干部参加，在会上说明了修建水库的重要意义，同时安排了搬迁村的拆石头工作，还确定了各乡大车和搬运石方的任务。³⁷在发动各乡派出大车时，搬迁委员会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依靠发动群众、社内自带草料、人送干粮的方法搬运石头。

搬迁和修建新房的过程，是首先由搬迁户自报，然后搬家委员会审议，最后大家讨论的办法，以确定各社户应盖的房间数。将拆多盖少的赔偿款发给住户本人，木料问题原则上由各社统一处理，并提出因陋就简的原则，这些均由搬家委员会统筹安排，适当进行规划。最后，确定926户4214人搬迁，共需要盖房3176间（其中有社队学校用房308.5间），每人平均0.75间，盖猪圈1053个，厕所991个。这些工程大约需要石方17542方，根据建筑工地远近时间，要求各社于旧历新年（2月17日）前完成。最后确定发动8个乡，1100辆大车及4500人于1958年1月14日开始了这一工作（其中有两个乡是26日开始的）。到1月31日，运送石头共计12000石方，占任务的70%，预计在旧历新年前能够完成。

在搬家盖房的过程中，指挥部还提出了一些口号，如“不怕寒风刺骨、大雪浇头”。工作开始十多天以来，社员情绪很是高涨。尤其是雪后，为了不延误工作，干部和社员甘冒零下二十度的寒冷，迎着六级大风进行架桥修建。大王店乡大队长周飞池向广大社员提出“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注意安全、任务不完不回还”的口号³⁸，从而鼓舞了社员情绪。由此，库区搬迁工作也得以顺利完成。

2. 竞赛式水库工程的修建

瀑河水库的修建始于1958年2月17日，基本竣工于6月底，仅有短短的近四个月的时间。

房样子的，组织到釜山村参观，并说明好房子可以多补助；害怕分散的，则号召全村集体搬迁。同时，在思想动员的工作方面，注意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防止地富反右坏份子破坏。

在房屋等级评定方面，按照高岗少填土、贫苦户能盖起来、等级屋价、幅度合理的原则。其中一等房屋52元；二等50元；三等48元。

随着搬迁工作的开展，与库区居民见面以后，针对社员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低落等情况，搬迁委员会采取了紧密地与生产结合、深入住户座谈、实施搬迁安排措施、通过培养骨干典型发言表态、召开大小会议教育社员等手段，逐步解决了思想问题。如范村有部分干部社员不愿意搬迁，经过会议的典型发言，带动了大家。其中六十岁的李洛为说：“我开始是搞不通，不愿搬，有乡土观念，可是听同志们一说，水库修好后，全县水利化，还给盖新房，这样可以了，政府需要叫搬就搬”。³⁴

搬迁委员会还通过结合实例、采取教育和辩论的方法打击“邪气”³⁵。屯里村民邢瑞青说：“政府叫搬家，还不定给盖什么样的小房呢？”³⁶这样一来，动摇了一部分不坚定户，据此搬迁委员会组织他们去釜山参观（曲水水库搬迁户）后进行了讨论和辩论，树立了其搬迁的坚定信心。通过宣传教育统一了社员思想后，搬迁委员会开始进行房产登记、审查和评议等工作。在房屋等级评定上，为了使得安排合理，搬迁委员会在范村开展试点，组织搬迁，村干部由现工作组直接掌握，组织就地讨论，按照标准，结合实际，划分等级，等级标准统一，解决问题，填完表后均通过了社员大会讨论、张榜公布等过程。

在土地调查和新村土地确定方面，搬迁委员会根据附近村庄、人口和土地，听取了搬迁村干部和社员的意见，进行了统筹安排。首先，召开了党委书记和社长支书会议，进行献地并具体研究土地的基本建设的处理（如机井、砖和石井等）；然后，组织搬迁户去献地村参观，由献地村介绍情况，并在生产上和一切物质方面

间。此工程的修建完成，依靠的是军事化、竞赛式管理，在强大的思想动员下，民工们以超强的劳动强度完成了这座中型水库的建设。

下面先介绍一下瀑河水库的工程情况。³⁹瀑河水库主体工程由大坝、溢洪道、放水洞、反滤层和护坡等构成。

(1) 大坝长5 700余米，有主坝和副坝之分。其中主坝长400米，高18.2米；副坝平均高5米。这项工程大约需要石土450 000立方，每工平均效率为一方，共需要用工450 000工。

(2) 溢洪道开山，底宽30.8米，长约104米，共计29 750立方。平均效率0.5方，则需用工59 500（外有消力池陡坡尚未设计出来没有计算在内）。

(3) 放水洞开山，底宽10米，洞长99米，工程量约106 735方，平均效率0.4方，那么需用266 837工。

(4) 反滤层（尚未设计出来），约计5 000石方（沙子），平均效率0.7方，需用7 143工。

(5) 护坡。需要沙子105 283立方，平均效率0.5方，需要210 566工；卵石54 160方，平均效率0.3方，需用工180 533。护坡外面需要砌石20 000方，平均效率0.7方，需要28 571工。运输石料5里（1里=500米）远，需50 000工。

此外，还需要修建护村埝，其中屯里村、贾庄村约3000米，约计150 000土方，平均效率2方，需用75 000工；围埝护坡需要沙子1 875方，用工3 750工；卵石1 875方，用6 250工；块石1 875方，需2 979工。漕夯、回填100 000方，平均效率1.5方，用工约66 700工。河床铺盖长约3 000米，平均宽20米，厚1.5米，用土方90 000方，平均效率2.5方，需用工36 000工。

按此设计的水库库容为：正常水位71米，蓄水53 450 000方；最大洪水72.8米，可蓄水65 400 000方。

为了及时地修建完成瀑河水库，指挥部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时间进度。整个水库的建设大致分为这样四个步骤⁴⁰：

第一步，溢洪道、放水洞的修建。闸门的安装等项工程计划投入1 200个劳力，昼夜工作。溢洪道工程计划1月25日至5月25日完工；放水洞工程集中技术力量昼夜突击，计划1月26日至3月6日完工。

第二步，漕夯、修筑反滤层。漕夯土方50 000方，每人效率1.5方，需用工33 350工，这一工程大体上分两步来做：

(1) 土坝漕夯，计划3月6日至3月10日，大约5天的时间完成。

(2) 块石河床漕夯，3月10日至3月20日完工。反滤层约计块石、粗细沙5 000余方，计划3月21日至3月25日完工。

第三步，筑坝，计划3月10日至5月10日完工。

第四步，修建护坡（包括沙子、沙石和块石），计划4月10日至5月15日完工。河床铺盖，预计于5月15日至5月25日完成。护村埝的修建计划于3月6日至4月底完工。

可以看出，瀑河水库虽然是一个中型的水利工程，但是预定的修建时间较短，且较长时间集中在冬季施工。这对于徐水县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瀑河水库是在响应国家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下修建的，因而当时的水利建设遵循着以小型为主、大型为辅，民办为主、国家辅助为副的方针。基于此，对于瀑河水库的建设，国家只支援了一百万元的物料款，与实际预算费用相距甚远。在此情况下，徐水县委决定除了依靠群众勤俭治水以外，不足部分由全县均摊。面临这样的困境，指挥部也指出了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⁴¹：

一是依靠合作化的优越性。社员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全民整风运动，思想空前提高；同时也有去年冬天水利积肥的锻炼，社员们已经具备了相关的经验和知识。

二是有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和支持，有省水利部门的技术协助，再加上我们主观的努力，正确利用过去施工经验，虚心学习，以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精神，可以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

在工作方法上,指挥部也进行了说明,即要充分发挥我们领导的技巧,依靠贫农,发挥党团的核心作用.如发动群众,有事和大家商量,在工作中掀起一个急干、猛干、苦干的革命干劲;通过工地革命台,提出合理化建议,搞宣传使水库修建的意义人人皆知;休息时间广泛开展文化娱乐,活跃民工文化生活,以搞竞赛、评比参观,搞运动的方法,树立旗帜,带动落后,把工作推向高潮.指挥部为了鼓舞大家工作,交流经验,规定定期评比,对模范大队、中队给予锦旗奖励,模范个人要颁发奖状、物质和精神奖励.

在详密的安排和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瀑河水库的修建也得以加速,甚至跃进.如“瀑河水库工地于3月15日前,仅有六个乡的民工2300名开始进行崩山和搬家盖房;3月16日起,又有十四个乡的10584名民工开始筑坝.目前投入水库建设工程建设的共二十个乡,有13033名民工.”⁴²

同时,在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指挥部在3月23日至29日开展了“跃进周”活动,并采取了四点措施⁴³:

(1) 思想动员.指挥部结合工程质量优劣和工地效率的高低,联系思想生活,组织了不同形式与不同内容的辩论会、张贴大字报、刊登工地战报、漫画等.如通过思想摸底,部分民工埋怨“活累,生活苦”,认为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不如在社里干活清闲,因此劳动不积极.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立即开展了“小米是哪来的,吃小米饭到底苦不苦”、“为谁修水库,怎样才能修好水库”的辩论.通过辩论,有8657人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领导,苦战三个月,不修好水库永远不回家”.

(2) 开展双比,设立三台.跃进周运动中,指挥部通过竞赛形式,设定评比条件,展开了石工与土工、土工对盖房工和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比干劲、比钻进的劳动竞赛,先进工地飘红旗,后进工地挂黑旗.工地上还设立了跃进台、

比武台、英雄台.工地遍地是跃进车、跃进篮、跃进坑和跃进父子车、夫妇车、姐妹车.崔庄村的青年突击队(18人)通过比赛跃进坑,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跃进周前为0.82个标准工,跃进周开始达到1.4工,最后提高到2.3工.

(3) 参观检查,组织工地会议.跃进周开展起来之后,为了鼓舞先进、帮助落后,指挥部及时深入工地,组织干部相互检查,从中发现典范,就地开会,评议谁先谁后,并随即进行全面综合,书写大字报,领导亲自向先进队送喜报,给落后队提出批评、建议.

(4) 总结评比,树立模范旗帜.在跃进周的末期,根据竞赛内容,依据工程质量、数量、安全、出勤等进行全面大检查.事后进行评比,共评出五个跃进大队,二十个跃进中队,先进模范人物九百九十一人,树立了单位和个人的模范旗帜.为巩固既得成果,鼓舞干劲,启发带动全盘,指挥部于4月1日召集全体民工,举行表彰大会.

这种竞赛已经成为瀑河水库建设的主要工作方法.建设期间总共开展了一个跃进周、三个突击旬、一个红五月、二个双周的竞赛活动.⁴⁴这些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工期.此外,工地的骨干积极分子,还开展了“双反、扫五气”运动,主要是针对工地上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盗窃国家的物料财粮、投机捣鬼、欺骗领导等坏人坏事进行了检举揭发,开展斗争,对劳动纪律松弛、自由散漫、消极怠工分子进行了辩论.⁴⁵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也成为了瀑河水库按计划修完的重要保障.指挥部为了使得水库于汛期前竣工,从1958年1月开始就很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总共发动了二十个乡的13025名民工,其中党员735人、共青团员1140名;为了以思想的跃进保证工程的跃进,建立了工地党委会和团委会,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团支部,大力加强了思想政治的领导,紧紧掌握了“兵马出动,政治先行”这一有力的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开展小型多样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指挥部还依靠群众办起了“工地战报”,共发刊28期.

应当说,瀑河水库的修建离不开有力的领导.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民工们的辛勤劳动.瀑河水库的修建使用了大量的劳力,是民工们在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才得以完成的.民工们的昼夜施工,才是水库按时完工的重要保证.当时曾参加修建瀑河水库的一位老人这样叙述他们的劳动情况.

“瀑河水库修建之前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是在征调劳力的时候由村支部作了宣传说明.征用的民工年龄约在18岁~50岁,是从各个大队(当时一个村为一个大队)按指标强制征用的.参加修水库那年我21岁,曾参加过搬家村盖房和修水库两项工程.当时也没有大型的机械,如推土机、挖掘机等,基本上是全靠人力,挖土用镐头、铁锹,运土则是用土篮、独轮车,大坝夯基则用石夯,每四个人抬一石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乡的壮劳力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较高的劳动强度.我们休息的时间很短,每天大约只有五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早上四点就要起床,四点半集合,去工地劳动,八点在工地吃早饭,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就要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晚上下班后就只有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我们吃的饭大都是玉米面饼子,劳动也没有报酬.对于逃兵、怠工者也有很严厉的惩罚机制,如摇煤球、批斗、熬鹰等.也有的人为了逃避劳动和惩罚而装病.”⁴⁸

水库的修建始于1958年1月(从搬迁算起),工程基本竣工于6月底.在当时建设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徐水县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建成一座中型水库.具体分析,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三方面:

政治武器.⁴⁶具体来说,主要围绕这样几方面开展工作:⁴⁷

(1) 第一是掌握思想底细,及时思想站队.首先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逐级进行思想摸底;然后,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研究,进行思想站队,将其分为思想进步、不甚进步、落后三种.通过调查摸底,民工的政治思想情况整体上是好的.但还存在着20%不甚进步的和10%思想落后的民工.

(2) 第二是加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密切联系实际.为了提高干部和民工的思想觉悟,根据思想摸底中发现问题与变化,指挥部及时召开骨干和全体民工大会,进行系统地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具体贯彻了农业发展纲要和全县农业生产跃进计划.例如,以回忆对比的方法讲解了过去、现在、未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并联系水库工程效益,说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大兴水利,根治千百年来的水患.这些报告和讨论,起到了显著效果,如河庄村的一名民工薛辉就说:“过去是给地主干活,今天是为自己劳动,定可得加油干.”中所营村的民工李运,刚来工地时劳动不积极,听了报告后说:“早是穷身汉,翻身分牛羊,参加合作社,生活又提高,从今积极干,报答共产党”.

(3) 抓骨干闹运动,抓思想搞辩论.为了使工程、思想双跃进,指挥部依靠骨干,闹运动,通过运动,深抓思想,及时开展辩论.主要方法是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并通过辩论及时地解决问题,提高民工的思想觉悟.

(4) 依靠群众,开展工地宣传.根据工区面广人多的特点,指挥部在全工地组织了一条宣传战线,从指挥部到小组,昼夜有专人负责,而且在群众中培养了1158名宣传骨干分子,划分宣传工区,设立宣讲台,结合典型事迹开展宣传.此外,宣传骨干还分头挑起宣传担子(内有麦克风、放音机),带上宣传品,日以继夜巡回工地,书写张贴大字报、画漫画、编数快板,

第一,水库修建过程中政治挂帅,充分发挥党团的政治优势,动员群众,做好民工的思想工作.

1957年冬开始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这个运动,应该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⁴⁹徐水县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也在本县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瀑河水库就是在这场运动中修建的,因而带有鲜明地政治色彩.

同时,瀑河水库的修建规划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各乡统筹安排来水库的民工,应是身体健壮的青壮年(年在18至45岁),贫农成分要占绝对优势,党团员要占15%左右;地主、富农、反坏分子不要.⁵⁰将劳力划成分,这已经体现出了瀑河水库的政治性,徐水县委、县政府将其看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瀑河水库修建的过程中,开展竞赛活动也成为重要的工作方法.竞赛活动中的评比记分也表现出了政治挂帅的特点(见下表).

瀑河水库大队评比记分表

	政治领导 (20%)	工程效率 (25%)	工程质量 (20%)	扫盲宣传 (15%)	卫生出勤 (10%)	安全保卫 (10%)	总评分数 100%
中所营	18.3	25	17.7	13	10	9	93
遂城	18.7	19	18.3	11.7	8	9	85.7
六里铺	17.7	19	17.7	13	8	8	83.4
南庞山	17.3	16	19	12	9	9	82.3
正村	18	15	18	13	9	9	82
文村	16.7	16	18	11.7	8	9	79.4
南庞村	16.7	13	17.7	13	9	9	78.4
釜山	16.7	12	17.7	11.7	10	9	78.1
太保营	17	12	18	11.7	10	8	77.7
义合庄	17.3	13	17	13	6	9	75.7
小刘庄	19.3	11	17.3	13	7	9	74.6
大王店	16.3	12	17	11.7	8	8	74
团结队	13.3	14	18.3	12	7	9	73.6
户木	15.3	10	18	11.7	7	9	71

资料来源: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不怕天长日晒,不怕狂风雨淋,胜利甸民工完成河床铺盖长十里,主坝上土一万六千方》,1958年7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通过这个记分表,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领导和工程效率的比重是处于前两位的,而工程质量则是处于第三位;在分值上,政治领导与工程质量等值,工程效率则大于工程质量.这就说明,指挥部较为重视政治工作,以确保工程效率和工程质量.

库区搬迁和水库修建过程中,指挥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动员会、辩论会、宣传等,成为水库修建的重要保障.在生产建设手段落后的条件下,对民工的思想发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前的“农村全民性整风运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这也为胜利地完成水库工程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⁵¹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次,完成土方 130 万方.它的修建得以按期完成,主要在于这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整个过程中,徐水县委开展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在设备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打破了按受益多少分摊劳力和物料资金的原则,采用全县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劳动力,按先后秩序进行施工,仅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建完成了这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的水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瀑河中下游的水害.这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具有促进作用.至此,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动员何以实现,或者说,强大政治动员的背后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本文认为,那时的政治动员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在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具备了政治动员的条件,从而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高效率.那么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一元化政治体制的产生呢?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国家控制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老话题,此研究范式关注的是权力在国家与社会的分布与作用状态.⁵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农村合作化的逐步实施以及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起了二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全面国有化或者集体化,而且表现为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受打击和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据了绝对领导地位.此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在农村,借助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反右斗争,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这既包括资源的分配权也包括对地方政府的干预权;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

第二,凭借合作化的优越性.

瀑河水库是在徐水县合作化实现之后和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兴建的.当时大跃进已经形成,对劳力实行无代价平调,全县大部分村义务出工,成为修建水库的劳动力.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实现了节俭治水.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也使得农民的行为具有了表面上的一致性——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上级的安排.据记载,此工程共调集民工 12 000 人,保定地区组织雄县、涿县支援 3 000 人,固城驻军支援 1 100 多人.⁵²

第三,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组织和管理体系,这是政治动员的组织基础,有效地保障了工程进度.

徐水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委委员三人组成的施工指挥部,专门负责瀑河水库的修建.指挥部下设若干股,负责具体事务.为了顺利完成库区居民搬迁,指挥部成立了搬家委员会.在水库施工组织方面,设立了中队(以村社为单位),中队下设组.指挥部还组织了一千余名的宣传骨干分子,负责宣传典型,发挥带动效应.此外,瀑河水库的修建计划有一个较长的规划过程,是由河北省水利部门花费一年半左右时间勘测而形成的,并且每部分设计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都有着较为精确的计算,因此具有较为科学的设计.这些因素使得在水库修建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得以实现,促成了水库修建的按期完成.

四、一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对瀑河水库修建过程的思考

1957 年冬,中共中央发起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拉开了全国性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徐水县作为兴修水利的先进县而得以闻名,瀑河水库的修建则将本县的农业生产大跃进推向了高潮,进而成为大跃进的典型.⁵³

瀑河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原属于海河规划,需投资 700 万元.后来河北省将其压缩至 500 万元.最后在民办公助的条件下,国家辅助 100 万元,其余资金自筹,共动用劳力 170 万人

府丧失了发展自主权. 两方面因素相加就导致地方政府权力的空壳化, 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 当时的各级地方政府就承担了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角色. 同时, 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权又都掌握在上级政府, 这就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化倾向, 它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完成上级政府分配的各项政治经济任务. 地方政府活动是以其代理人角色为前提的, 所以称其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⁵⁵

基于此, 徐水县政府也可被视作国家政权的一级代理人. 当中共中央发出兴修水利的号召时, 全国范围内开始积极响应, 徐水县也“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典型”. 瀑河水库就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修建完成的. 它的修建, 尽管国家只拨款 100 万元作为物料款, 与实际使用资金相差甚远, 但是徐水县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 按期完成了修建计划.

(二) 社会主义教育与自我保护性顺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政党, 在革命战争时期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后亦然, 这也是它能够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面,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搞运动的手法. 为了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和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中国共产党于 1942 年在党内开展了第一次整风运动,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⁵⁶. 这次整风在提高了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同时, 也消除了党内指导思想的分歧, 实现了党内的统一.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成功尝试. 此后, 在 1947 年冬至 1948 年, 解放区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 进行过一次整党运动; 建国初期, 1950 年开始至 1954 年春, 也进行过一次整党整风运动. 这两次整党, 也都比较好地达到了当时的目的, 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 纯洁了组织, 改进了党风.⁵⁷

鉴于前几次整党整风的成功经验, 在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 为了让党员了解新情况和新任务, 摆脱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中共中央于 1957 年 4 月 27 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此次整风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因而这次整风不再局限于党内, 而且邀请民主党派帮助. 由于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批评尖锐, 还有一些极右派分子趁机诽谤中国共产党, 以及波匈等国际形势的影响, 整风运动转为了反右派斗争, 并且中国共产党错误地将其扩大化. 在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后, 1958 年 8 月 8 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要求在农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举行一次大辩论. 这次大辩论与反击右派及批判客观存在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有关, 也是为了解决农村快速合作化中表露出的问题而进行的.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 就曾经出现农民大量宰杀耕牛的现象. 1955 年 1 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指出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 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 30 万头, 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了 20%.⁵⁸ 到了 1957 年春, “因社员收入减少和许多干部作风不民主以及没有很好地贯彻互利政策”⁵⁹ 等原因, 在农村地区, 一部分富裕中农又开始出现闹分社、退社的风潮. 中共中央对此冷静对待, 及时采取措施. 这样一来, 到了 1957 年夏, 全国范围内的退社风潮得以缓和, 但是在不少地方合作化的情势也不容乐观, 夏粮统购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⁶⁰ 在这种背景下, “各地农村开始执行中央指示, 普遍进行了以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为中心题目, 以‘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实质的大辩论, 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弄清

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道路’”⁶¹。

然而，这次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以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所‘发明’的‘大辩论’（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形式来进行，侧重于从反面批判个人主义思想、本位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⁶²。应该说，在当时看来，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绩：一是‘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主义风气占了绝对优势；农业合作社得到‘巩固’，粮食统购任务超额完成。⁶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亦称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实质上是运用阶级斗争的专政和意识形态的压力等强力手段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向其他阶层和人群展示了强大的威慑力，体现出共产党强大的专政能力，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强力控制。⁶⁴

徐水县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潮中，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1957年5月25日，徐水县召开了第一届党代会第三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制定了本县的整风运动计划。此时的整风还是发动党内外人士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到了7月中旬，随着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徐水县整风运动的主题就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了反击右派的斗争。7月15日，徐水县委召开了县、区、村三级干部2635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张国忠做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击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动员报告，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在这期间，“政府根据群众揭发和确凿证据处理了一批地、富、反、坏，其他地、富、反、坏也全部在大辩论中被辩的臭气熏天，不能不低头认罪；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也在大辩论中被辩的张嘴结舌，表示了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誓愿”⁶⁵。除此之外，“在整党整社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基础

上，广大的党团员干部和全县人民从烈火当中锻炼得十分坚强，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坚决拥护统购统销，巩固工农联盟和保卫社会主义法制”⁶⁶。

徐水县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不仅仅停留在思想方面，还贯彻到生产建设中去，通过整风和辩论达到促进水利建设和增产增收的目的。如1957年5月10日，徐水县委在向保定地委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了将政治思想工作与麦田点种间作相结合的优越性⁶⁷；1957年11月25日，史各庄平原水库动工，但是由于民工少，进度缓慢，县委书记张国忠就召集附近几个乡党委书记对修建平原水库进行辩论，批判了“没钱不修，打破地界不修，不直接受益不修”的思想，形成了打破乡界、地界，农民自带干粮，义务修水库的劳动场面。⁶⁸在这种背景下，瀑河水库的建筑工地上就出现了政治挂帅、思想宣传活跃、施工竞赛活动火热的场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民工们的潜能，保障了工程能够按期完成。

民工们能够遵从徐水县委和指挥部的领导、安排，除了思想鼓动的原因之外，农民采取了“自我保护性顺从”⁶⁹的策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参加过修建水库的老人说对于怠工者和逃兵，有着较为严厉的惩罚，也发生了批斗、摇煤球、熬鹰等粗暴行为。如此一来，在合作化过程中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的农民，只能听从上级干部的安排，加之阶级斗争方法在施工过程中的运用，虽有反抗但是遭到了严厉的惩罚。面对这种境况，农民为了保护自我，只能采取顺从的行为。

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及阶级斗争手法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也有效地发挥了这种体制的作用。瀑河水库的修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三）完整的政党组织体系为一元化政治体制提供了组织保障

“王政止于县”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状况，县以下一般由乡绅进行治理。而中

国革命则打破了这一传统,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在县以下设置乡镇和村。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设立乡镇和村级政权的同时,还设有乡镇党委和共产党的村支部,党的机构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意味着,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在革命胜利之后已经嵌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中,并居于核心地位。鲍大可(A. Doak Barnett)曾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把中央政权的权限和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央权力经由完善的官僚机构传达到县一级,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力——至少在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国家的时候——但是在县以下,由传统的精英团体如“士绅”以及各种非官方社会机构治理的“非正式政府”,则往往支配着舞台。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们基本上摧毁了旧的精英团体和大部分传统社会机构,代之以新的共产党精英和新的由共产党建立和支配的群众组织,并且把党和政府的正式官僚机构扩大到村庄一级。⁷⁰

就这样,“负责行政职能的政府和负责决策、协调和监督的党,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经过许多中间层次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工厂、学校和居民区的、既独立又密不可分的层级组织”⁷¹。中国共产党通过官僚机构将权力延伸到村一级,建立起了政党国家(Party-State)体制。这种体制是中国试图解决20世纪初以来全面危机的最终反应,也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恢复并加强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丧失掉的对地方的统合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所以它具备了掌握一切国家资源的条件。与此同时,实现社会、政治与民族革命一体化的中国共产党,导致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通过建立与农民的有机联系以及一系列同心圆联盟中寻求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合作关系,扩大了政治动员和参与的范围。⁷²在掌握全国

政权之后,这种动员能力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可以这样说,现代革命已经将农村民众带入了政治生活。⁷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权贵,建立起了党的控制,创造乡村一级的新秩序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⁷⁴而党的控制又与通过意识形态教育而获得的支持相结合,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中国社会中去。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过程中树立的权威在最大程度上运用,特别是在让基层干部和农民大众做出决断方面。⁷⁵例如,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对于实施集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基层干部,上级领导是这样鼓励他们的,“不要害怕,有共产党的领导,你是干部必须要站在前面”。⁷⁶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贫农在合作化政策实施时也发言,“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社会主义的道路咱们不走叫谁走?”。⁷⁷另一方面,在领导方法上,重视“由上至下”的方式,并在各个层级强化的共产党书记的权力相结合,借此实施政策的渗透。⁷⁸

在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中,徐水县委可以通过党的三级组织(县、乡、村)来实现民工、施工材料的征调,并由指挥部(也建立了健全的组织体系)通过宣传教育、施工竞赛等方式,挖掘农民的潜能,将共产党的权威运用于水库的建设中,借以实现对于该县来说的浩大工程。此外,瀑河水库在修建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十分详细的规划,而能够有秩序地完成这些规划,同样离不开“官僚体系(政权体系)”的作用。

所以说,19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紧密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政府的功能替代。中国共产党借助其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再加上它娴熟的政治宣传、教育技能,有效地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元化政治体制。

五 结语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 古老的中国开始探索独立、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有些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者政党, 对于改造或者重建社会国家与各项领域中的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 然而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承担起如此之重任。现代化启动的八十年之后, 在广袤的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探索独立、富强现代化之路的新生力量。正如邹谠所言, “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 从阶级斗争中又引伸出群众的观念, 并以它的严密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 去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 引导群众参与政治, 所以在革命的过程, 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 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不少上升为干部。”⁷⁹ 这就说明了在政权革命过程中, 政治要全面渗入社会, 以便于动员一切资源以赢得革命的胜利, 从而也就形成了“全能主义”⁸⁰ 政治。从 1942 年起, 中国共产党借助延安整风就开始在根据地建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 并把它当作是“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全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⁸¹。然而,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 国家社会重新建立起来了, 全面危机也过去了, 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与任务, 它的应用范围应当缩小, 可是从院系调整开始, 经过反右扩大化一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全能主义政治的趋势, 反因取得政权、党外政治力量降低、群众路线无形中的失效、党内民主的削弱, 而有逐步升级的趋势。⁸² 这是因为, 1949 年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需要一个能够集中权力的指挥中心, “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得以保留并被重新肯定, 进而通过反右斗争和合作化运动将之强化。

大跃进运动, 就是共产党一元政治体制下全能主义政治作用的产物。在工农业生产极其落后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改变这种境遇, 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了促进生产跃进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的群众运动。从总体上说, 虽然大跃进是一场灾难, 但是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 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瀑河水库的修建完成, 有效地缓解了瀑河流域的旱涝灾害。所以说, 当社会不能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之时, 国家职能扩张、侵占和占领某些社会领域是具有正当性的。

但是, 与西方国家的建立是从“公民”的概念出发不同, 新中国的建立实际是以“群众”的观念为指导思想。基于此, “群众”是一个集体概念, 它注重社会某些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 而可能抹杀或者忽略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因为, 有的时候国家(政府)会以集体的名义来要求个人服从。如瀑河水库的修建, 虽然从结果看有利于瀑河流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但是在修建之前并没有向农民征求意见, 修建过程中一些农民时有“反抗”, 然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对此有着一套较为“有效”的处理办法, 能够防止因个人行为而影响到整个施工过程。农民最后选择了“自我保护性顺从”, 他们的意志被淹没于“集体主义”的要求之下。通过瀑河水库的修建, 我们可以看出农民作为理性人对于国家意志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直接原因就是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 往往只注重效率原则而忽视了公平原则。虽然存在着不满, 但是这种高效率仍然能够得以实现。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实现了颇有成效的动员。我们可以将这种动员体制称之为“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⁸³ 这种政治动员体制的有效性就表现在, 即使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也能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过程中实现“思想的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要因是地方政府在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农民时采取的一系列非法但有效的手段。所以, 在一元化政治体制下,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缺乏参与性和公开性, 而且它的供给往往不遵循受益原则, 而是着眼于效率原则, 这样就会轻易地忽略农民的意志和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开始消退,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在逐步实现“有所为,

有所不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意味着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的多元化,实际上开始松动一元化政治体制中的思想控制,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后全能主义”时代.在农村地区,土地的家庭承包实施以后,农民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自主权;村民自治的实施,从制度上也赋予了农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互动的情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再也不能向大跃进时期那样,采取集权式动员方式,无偿地征调农民劳力.兼顾公平与效率,让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才是新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农村地区实现国家权力性质和行使方式的转型,即从掠夺性权力向建设性权力转变,由集权式转向民主化权力运行方式,给农民更多民主参与的权利与机会.由此,中国需要在国家权力转型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这也是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得到“2009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作者简介:李汉卿(1982—),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注释:

1 这里的胜利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4 详细内容参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5 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存在了近二十六年之久,学界按照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度变迁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58年4月~1962年2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也叫大公社时期),此时体现为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一是从1962年3月~1983年10月的人民公社时期,此时体现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度.参见辛逸:《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 《河北徐水县成立人民公社》,《河北日报》,1958年8月22日.

7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p36

8 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蔡江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21页.

9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页.

10 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第36页.

11 姜炳寅:《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矛盾及对策分析》,河北农业大学管理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9页.

12 张红:《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现状、成因及对策》,《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第56页.

13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4 《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第1版。

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15 关于瀑河水库的介绍参阅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16 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17 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关于完成水库情况简报》，1958年1月9日，徐水县档案馆。

18 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19 张国忠：《全面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深入开展农业增产竞赛运动，为胜利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粮棉增产计划而奋斗——张国忠同志在中共徐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印，1956年3月26日，徐水县档案馆。

20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2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22 《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23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的。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对此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而形成了修正草案。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第1、2版。

24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第1版。

25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

26 为了学习和贯彻《农业四十条》，1956年3月26日，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专门的报告；1956年3月27日，中共徐水县委制定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执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划（草案）》。这两份文件均存于徐水县档案馆。

27 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28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29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30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31 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32 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33 大车指的是马拉的车或骡子拉的车。

34 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35 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36 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37 分配拆石头工作是因为盖新房需要石头做地基，为了减少材料费需要将旧房的石头拆掉；而大车则是运送盖房材料所需。

38 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
徐水县档案馆。

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
县档案馆。

39 这部分主要参阅瀑河水库指挥部：《徐
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
水县档案馆。

40 这部分主要参阅瀑河水库指挥部：《徐
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
水县档案馆。

41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
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
档案馆。

42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
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
水县档案馆。

43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
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
水县档案馆。

44 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瀑河水库施工
以来的情况》，1958年6月8日，徐水县档案馆。

45 瀑河水库指挥部：《领导挂帅，骨干串连，
人人立志宣誓，队队干劲冲天，群英大闹决战旬，
奇迹迎接红五月》，1958年4月20日，徐水县
档案馆。

46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
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
徐水县档案馆。

47 这部分主要参阅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
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
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48 这部分内容是由笔者于2009年8月24
日在徐水县户木乡户木村访谈村民赵某得知。

4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
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50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
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
档案馆。

51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

52 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
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
页。

53 关于徐水县兴修水利和开展积肥运动
的报道主要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
《推荐河北省徐水县的几个主要经验》，《中国
农报》，1958年，第5期；人民日报社论：《徐
水创造了好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3月
11日；《徐水县在生产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思
想工作》，《河北日报》，1958年4月1日；《中
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
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1958年4月
17日等。此外，全国各地还纷纷派人参观瀑河
水库的修建现场。这都说明徐水县已成为兴修
水利大跃进的典型。

54 根据权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布和
作用状态，可以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划分为三种
理论模式，即：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国家
与社会互动理论。相关内容可参阅邓正来，景跃
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于邓正来：《国
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55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这个概念是由杨
善华和苏红提出的，他们借鉴了张静的“政权经
营者”概念，意在指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乡镇一级
政府（包括人民公社）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
代表，其活动的前提是代理人角色，因而称之为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参见杨善华、苏红：《从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
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0页。

56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57 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
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
页。

58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59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656页。

60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

61 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62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52页。

63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65～666页。

64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72页。

65 张国忠：《徐水县农业生产大跃进前后若干情况的补充说明》，载于徐水县委办公室编：《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66 张国忠：《徐水县农业生产大跃进前后若干情况的补充说明》，载于徐水县委办公室编：《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67 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在麦收前进行麦田点种间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向地委的报告》，1957年5月10日，徐水县档案馆。

68 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69 这个概念是由斯科特用来解释塞达卡穷人对富人的表面依附的。他认为，“对那些生计更为确定无疑地依靠村庄经济的人而言，顺从的压力无所不在”。参阅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年版第337页。

70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28～429. 转引自斯科克波 (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64页。

71 斯科克波 (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65页。

72 邹谠：《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73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7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75 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一九八八年、一 一六頁。

76 竹内実編『人民公社史』平凡社、一九七二年、五六頁。参照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一九八八年、一 一六頁。

77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人民日报》，1955年9月20日，第2版。参照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一九八八年、一 一七頁。

78 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一九八八年、一 一七頁。

79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80 “全能主义” (totalism)，指的是一些

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本特性,即: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对某一个社会领域可以非常强烈,同时对另外一个领域非常松懈.具体内容参阅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7页.

81 庞松、韩刚:《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回顾与改革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4页.

82 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83 这个概念是于建嵘提出的,用来描述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政治的特征.参见于建嵘:《岳村整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5页.本文认为这种乡村政治体制成熟于大跃进时期.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3]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5页.

[4] 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5] 张国忠:《全面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深入开展农业增产竞赛运动,为胜利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粮棉增产计划而奋斗——张国忠同志在中共徐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印,1956年3月26日,徐水县档案馆.

[6] 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

[7] 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8] 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9] 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关于完成水库情况简报》,1958年1月9日,徐水县档案馆.

[10]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11] 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瀑河水库施工以来的情况》,1958年6月8日,徐水县档案馆.

[12] 瀑河水库指挥部:《领导挂帅,骨干串连,人人立志宣誓,队队干劲冲天,群英大闹决战旬,奇迹迎接红五月》,1958年4月20日,徐水县档案馆.

[13] 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14]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15] 谭震林:《推荐河北省徐水县的几个主要经验》,载于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办公室:《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16] 人民日报社论:《徐水县创造了好经验》,载于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办公室:《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17]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载于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办公室:《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6~19页.

[18] 《徐水县在生产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载于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办公室:《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19~31页.

[19]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20] 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1]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

[22]贾艳敏:《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23]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收录于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24]庞松、韩刚:《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回顾与改革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25]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26]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7]邹说:《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一九八八年、一一七頁。

[29]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